

总主编／季羨林

著／朱汉民

邓洪波

高峰煜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

长江流域的书院

CHANGJIANGLIUYU DE

SHUYUAN

湖北教育出版社



G649.2995/1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

总主编 季羨林

副总主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汤一介 李学勤 张正明

俞伟超 袁行霈 章开沅

执行副总主编 陈 昕 刘玉堂

长江流域的书院

CHANGJIANGLIUYU DE

SHUYUAN

著者 钱穆 邓洪波 高峰煜

经济科教系列

主 编 章开沅

副主编 陈 昕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一 缘 起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这一点并不稀奇,世界文明古国颇有几个。但是,中华民族最爱历史,简直可以说有“历史癖”,我们有几千年之久的历史典籍,连绵不断。每一次朝代更换,下一个朝代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第一批要做的事情中往往就有为前代修史。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真可以算得上稀奇了。

中国旧日把所有的典籍分为四大部分:经、史、子、集,名之曰“四库”,史学典籍是其中之一。四库中有关文化的记载,比比皆是。再加上考古发掘,因此对研究中国文化史或文明史是十分有利的。然而,在欧风东渐以及日本风西渐以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专门研究文化或文明的著作,如凤毛麟角,绝无仅有。其原因何在呢?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文化”和“文明”两词,都是古已有之的,然而涵义却同我们今天使用的不无差异。今天的涵义,多少有点“出口转内销”的意味,有点受了西方或日本的影响。名词是旧名词,却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旧瓶装新酒”。中国旧日学者往往不把文化或文明作为独立研究的对象,所以这一方面的专著就只好付诸阙如了。

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家,在这一方面读过一些书。但

并没有真正下过工夫。根据我的推测,赋予“文化”或“文明”以新的涵义的时期,可能是在 20 世纪初叶,极有可能是受了外来的影响。其后间有以文化史或文明史名书名文者。在我上大学的时期,也就是 30 年代初至中叶,最著名的一部书是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此书原系大学讲义,后连载于《学衡》,最后成书,于 1932 年出版。此书总起来看,走的还是旧的路数,但是材料颇为丰富,间亦有新观点,而且规模颇大,不愧是筚路蓝缕之作。书中对黄河文化,也就是北方文化,和长江文化,也就是南方文化,都有所涉及,对于两方面的交流,也举了一些例证,可供我们今天参考。

建国以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术界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则是“万马齐喑”。真正文化研究是谈不上的。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宽松了一点,思想解放了一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对文化的认真的研究也提到日程上来了。80 年代腾涌于全国的“文化热”,是顺应时势的壮举。这大大地推动了文化的研究。从整体文化研究一直到地区文化研究,都是百花齐放,灿烂辉煌。地区文化研究更是空前兴旺。楚文化、齐文化、吴文化等等,都推出了规模大、质量高的专著,令人耳目为之一新。长江文化研究,更不敢后人。有关机构邀集了与长江文化有关的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努力,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由李学勤教授和徐吉军教授主编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资料丰富,探讨深入,论点鲜明,成为空前巨著。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湖北社会科学院,更上一层楼,扩大了邀请专家学者的范围,以全国为目标,敦请对长江文化研究有兴趣,有造诣的著名学者,担任编写工作,编成了这样一套《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包括一个“综论”系列和其他六个系列,共五十多部,真可谓洋洋大观,前无古人了。从内容上来看,这套《文库》综合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又加

以扩大和加深;从时机上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世纪和新旧千纪转换之际。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这套《文库》都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为 20 世纪做了总结,为 21 世纪导夫先路。我相信,它会受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对长江文化有兴趣的读者欢迎的。

二 文化中心或重心问题

我是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的,意思就是,全世界文化是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国家有大小,民族有众寡,因此创造的文化有多有少,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所创造,有所贡献,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那种认为只有一个民族能创造文化,而其他民族则都是文化的破坏者,是法西斯论调,有识者只能嗤之以鼻。

世界各地,中国各地,虽然都能产生文化,但是,由于人类生存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相差悬殊,这就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于是就产生了文化中心或重心。这是世界和中国共有的现象,不足为怪。

英国著名的史学家汤因比,穷毕生之力,写成了一部巨著《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ets)(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新 1 版),从最广阔的宏观上,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探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情况和规律。他把世界文明分为二十几个,名之曰“社会”或“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或者重心。关于中国文化,他在该书中前后看法就有改变。他先列了二十个“社会”。其中第六个为“远东社会”,第十个为“古代中国社会”。后来又把“远东社会”分为“中国社会”和“朝鲜—日本社会”,最后他又增加了一个“黄河流域古代中国文明以前的商代文化”。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分类或者分区有点拿不定

主意。

汤因比对中国文化有下列一些论述。《历史研究》(上),第28页,他说:“古代中国社会的策源地是在黄河流域,它从这里扩展到长江流域。远东社会的策源地把这两个流域都包括在内,然后一方面沿着中国海岸向西南方扩展,另一方面向东北扩展到了朝鲜和日本。”他这些意见,我们不见得都能同意,抄在这里,聊备一格而已。

同书,第92页,在“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一节中,汤因比写道:“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从种族上看来,好像同南方和西南方广大地区的居民——从黄河到雅鲁藏布江之间,从西藏高原到东海和南海——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在这样一片广大的人群当中,有一部分人创造了文明,而其余人都在文化上毫无所有,我想这个理由也许是他们虽然全有潜伏的创造才能,可是由于某些人遇到了一种挑战,而其余人等却没有遇到的缘故。……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像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南方的居民,例如在长江流域的居民,他们没有创造文明,他们为生活而斗争的艰苦性也的确比不上黄河流域的人。”在同书第109—110页,汤因比比较了黄河和长江的自然条件,认为长江条件比黄河优越,“然而古代中国文明却诞生在黄河岸上而不是诞生在长江流域”。这些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长江流域条件优于黄河流域,为什么后者能创造文化而前者不能呢?

汤因比能够把中国文化放在全世界众多的文化中心中来加以审视,加以比较,这是他的贡献;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并非汉学家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得不够深入,再加上他写《历史研究》时,中国的考古工作还很滞后,中国学者本身对长江文化了解得也颇为肤浅,因此不能苛求于一个外国学者。汤因

比能把中国文化研究到这个水平,我们对他也只能表示敬意了。他提到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关系,下面我还将要谈到。

继汤因比之后,我想再介绍一位外国学者,这就是美国哲学家、史学家杜兰。他穷四十年之力,著成了一部规模大大超过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力作,原文名叫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直译应该是《文明的故事》,现译为《世界文明史》,全书共分十一卷,再加上一个“结论”。每一卷内容都异常丰富。重点是放在欧洲文明上的,只在第一卷“东方的遗产”中讲了埃及、近东、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对中国文明讲得不算多,我不打算介绍。但是,第一卷第一章“文明的条件”,却很值得介绍。杜兰先给“文明”下了一个定义:“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紧接着他又讲了五个条件:地质的条件,地理的条件,经济的条件,种族的条件,心理的条件,最后还讲了文明衰退的原因。

这些对我们研究长江文化都有参考作用。我之所以在这里介绍两位外国学者的学说,是因为我最近几年来深感中国学者对外国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够重视。时至今日,地球已经变成了“地球村”,鸡犬之声相闻。如果我们仍然不闻不问,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极为不利的。外国学者的意见,不见得都正确,正和我们本国学者一样;但是,他们往往能够从一个新的我们注意不到的角度上来看中国问题,即使是肤浅或者甚至荒谬,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

杜兰给“文明”下了一个定义。据说世界学者对“文化”或“文明”下的定义有数百个之多,那就等于没有定义。杜兰的定义也只能是一家之言。但是,“文明”和“文化”两个词儿他都使用了。这就使我们也不得不考虑这两个词儿的涵义。就我个人浅见所及,“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消灭了野蛮就是文明;消灭了愚昧就是文化。由此可见,文

化和文明两个词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候颇难以区别。在欧美,这两个词儿有时也是混用的。

现在再回头来谈我们的文化中心问题。我常常想,就世界范围来说,文化的分野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中国来说,文化的分野却是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这个现象也许可以用杜兰的“地理的条件”来解释吧。

中国的北方文化源于黄河流域,南方文化源于长江流域,更南的则产生于珠江流域。南北文化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专就文学而论,北方可以《诗经》为代表,南方可以《楚辞》为代表。艺术风格和思想内容,都是不同的。如果用几个现有的词儿来说明的话,则北方文学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而南方文学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这从地理环境方面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给一隅而以反三隅,南北文化的特点也大体上可以推断出来了。

过去的中国典籍,以及近代的历史著作,一讲到中国文化,往往把中心或重心放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文化上。这并不奇怪,不能说是没有历史根据和事实根据。根据传说和历史记载,虞夏商周各个朝代,建都都在黄河流域。当时的政治中心,也往往就是文化中心。因此,说中国古代中心或者重心是在北方黄河流域,不能轻率地称之为偏见。但也不能说,其中毫无问题,不能说这种说法完全正确。我的意见是,原因在于研究不够。现在根据历史记载,特别是根据考古发掘工作的结果,南方早就发展起来了水平相当高的文化。长江流域无论矣,吴、越、楚、蜀等文化不都是长江文化吗?远在长江之南的广东、福建等地在很早的时期也都有了可观的文化。连无法解释为什么“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的南方人没有创造文化的汤因比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全有潜伏的创造才能”。汤因比由于对历史情况了解得不够多,所以才做出了错误的结论。

三 文化交流

这里包含两个内容：一、中外交流；二、南北交流。

文化这种东西是具有很多特点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扩散。也可以称之为交流。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特别是与人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发明创造，立即自动地传播开去。最古的例子，比如采集技术、狩猎手段、种植技术，等等，都是最容易交流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东西，比如神话、传说等次之。以后，人口日益增多，交通日益方便，于是文化交流也就随之而日益频繁。即使在蒙昧的远古，在有文字记载以前，文化已经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无孔不入，无远弗届。中国同美洲隔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但是中国人早已到了美洲。至于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路程，则还不清楚，有很多争论，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楚。

谈到先秦时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十分坚实的事实根据现在我们还没有。但是交流的迹象却是不不少的。《战国策·楚策一》中的“狐假虎威”的说法，有人研究，认为可能不是中国土产。先秦典籍中，类似的例子还可以找出一些来。《楚辞》中的例子就更多。《天问》中的许多神话都带有“异域”的色彩。《离骚》一开始的几句话：“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其中“摄提”这样的名词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现代学者们研究的结果证明，在很古的时代，长江流域的楚国和巴蜀地区就有一条通过云南到达缅甸和印度等地的道路。尽管地势险阻，行旅困难，但毕竟是能够通过的。

在北方，齐国濒临大海，尽管在最早的时候只有独木舟作交通工具，但毕竟能与海外联系，知道一些海外的信息。齐国的驺衍之所以独能倡大九州之说，良有以也。到了秦代，对外交通更

方便了,徐福东渡瀛洲的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说:“自战国驺衍传大九州之说,至秦始皇,汉武帝时方士迂怪之论,据太史公书所载(始皇本纪封禅书孟子荀卿列传等),皆出于燕齐之域。盖滨海之地应早有海上交通,受外来之影响。以其不易证明,姑置不论。但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播,必与此滨海地域有连,则无可疑者,故汉末黄巾之乱亦不能与此区域无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现在再谈中国国内的文化交流,具体地说,就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或者比长江更南的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由于没有大海大山的阻挡,起源应当更早,交流应当更频繁。因为头绪过多,我无法详细叙述,只能笼统地谈一谈。资料过于丰富,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征引。我现在仅仅根据现有的两部书:一部是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一部是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前者出版于将近七十年前,后者出版于1995年,一新一旧,可以看出观点之异同,也可以看出学术研究之进步。

柳书中颇多讲南北文化交流的地方。我只能极其简略地加以介绍。上册,第274页,柳先生说:“隐桓之世,齐郑最强。郑居中原,齐则东方之大国也。庄僖之世,齐桓称霸,而晋楚秦三国相继而兴,其势渐趋于西南矣。成哀而后,吴越复兴,天下大势,偏重南服。故春秋之时,实为文化自北而南之时。楚之先出自颡顼,固亦神明之胄,然自初封于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传至熊渠已五叶六君,而熊渠犹自居于蛮夷。”这里脉络讲得简洁明了,文化自北而南,说得也有道理。

第284—286页,讲老子与孔子的关系。柳说:“老子生于陈而仕于周,并非楚人。世之论者,以史记有楚苦县人一语,遂以老子为楚人。因以其文学思想,为春秋时南方学者之首领,并谓与孔子之在北方者对峙。”柳先生不以此说为然,说:“其说倡于日

本人，而梁启超盛称之。”他接着说：“实则苦县故属陈，老子生时，尚未属楚，史记索隐正义言之甚明。（中略）藉令其地属楚，亦在淮水流域，距中夏诸国甚迹，未可以南北判之也。”这个公案，由专家们去审断吧，我在这里不想进行论证。

柳书，第213—215页，还指出孔子众多的弟子中有南人，这一方面表示，孔子生时影响已经极大，同时也能表示南北文化的交流。同书，上册，第二编，第四章“南北之对峙”，主要讲的是三国时吴魏对峙的情况。一直到晋代，南方长江流域人才辈出。吴人入洛，虽为北人所轻，然而南方文化人的光辉是掩盖不住的。惠愍之际，北方胡人大举入侵，北方的文化人大量南渡，有人称之为“衣冠南渡”，北方文化因之大规模地流入南方长江流域，其影响是深远的。这可能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这不禁令我想起了印度历史上北方穆斯林进入，大量的文化人婆罗门逃往南印，其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在晋以后一直到今天一千多年的时间内，由于交通更加方便，南北来往更加容易，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交流，日益频繁，柳书都有所涉及，我就不再抄录了。

现在再谈一本最新的书《长江文化史》，这部书同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比较起来，尽管后者之功不可泯，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在下面简略地介绍一下书中有关南北文化交流的论述。

史前的情况不介绍了，我的介绍从春秋战国时代起。该书第二章，第七节，第173页“超越中原”，讲到春秋中晚期楚文化发展的情况。文中说：“中原的文化本来就比较发达，因此，楚人对中原既有侵吞之意，也有歆羡之情。春秋五霸，主要是两霸：一为楚，一为晋。楚晋角逐，究其实，就是长江中游文化与黄河中游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下面又讲到楚国一些国王对战争的见解，都是极为难得的。特别是楚庄王，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他统



治时期,楚国的精神文化,决不让中原文化专美于前。文中说:“楚庄王克敌制胜,不以功自矜,而以暴自责,这样的见识和气度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他对战争与和平、武功与文治的辩证关系有透彻的理解,在春秋战国时代为数众多的明君、贤臣、良将中如鹤立鸡群,在世界军事理论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创见。”(第 174 页)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说当时楚文化,也就是长江文化,超越北方黄河文化,决不是无的放矢的。

该书在下面又论到淮夷文化、吴越文化、扬越文化及其楚化。到了楚文化鼎盛时期,又出现了富有浪漫色彩的文学,彪炳千秋。下面(第 206 页)又论到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巴文化和西南夷文化,基本上都属于长江文化范围,我就不介绍了。

第四章,标题是“南北对峙与文化交融”,主要是讲南北文化交流的,是很重要的一章。书中讲了三国时期、西晋时期和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第二节“西晋时期的长江文化”,下分三目:一、“长江流域行政建置的增设与经济文化的发展”;二、“蜀、吴人士入仕中朝及其文化影响”,讲的是长江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影响;三、“永嘉之乱与中国封建社会文化重心的第一次南移”(第 362—364 页),这个问题,我在上面介绍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时已经谈过。北方战乱肆虐,不仅是“衣冠南渡”,一般老百姓南逃的人数也大得惊人,根据谭其骧先生的估计,约有 90 万人,占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强。“衣冠”泛指文化人,他们的“南渡”,造成了中国文化重心的第一次由北向南的大转移,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该书在西晋后的许多章节里面详尽地介绍了长江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交流的情况,写得都很精彩。如在此介绍起来会占去很多篇幅,而且同我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读者自己去读吧。

到了该书第七章“宋元长江文化的成熟”，其中第二节“中国封建社会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节。书中（第719页）说：“长江流域经济的繁荣、文教的昌盛、私人讲学风气的流行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使宋元时期的长江文化终于确立了中华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也是重要的。下面第三节（第729—742页）“宋室南迁对长江文化的影响”，讲到“靖康之难”（1126年），南迁的人口在150万至200万人之间。我认为，这是继“永嘉之乱”以后的第二次“衣冠南渡”，其意义是无比重大的。从那以后，800多年的时间内，朝代变了几个，虽然北京始终是首都，可以说是政治的中心，但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或重心，始终在南方，主要是在长江流域。我现在立一个假说：经济和文化没有南北重心而是南北均衡地发展，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种均衡发展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阶段，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我这个假说能否成立，请专家们加以评断。

南北文化交流就介绍到这里。

我之所以这样刺刺不休地讨论南北文化交流的问题是有我的用意的。我个人认为，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年的文化，而文化又是立国之本，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差异是南北问题，南方以长江文化为代表，北方则以黄河文化为代表。按时间的先后，北方文化可能发展早一些，而南方文化也从极早的时代起就发展了起来，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南北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整体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我在上面谈到文化中心或重心的问题，通过我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心并不总是固定的，一个时期在北方，另一个时期又在南方。把南北两大区域文化研究清楚，中华文化的总体也就清楚了。从宏观上来看，文化中心先在北，宋元时期始，移向南方，虽然在政治上北方仍是中心，因为首都是在

北京。有没有南北文化均衡地发展的时期呢？有的，我个人的一个假说，上面已经谈过了。从那以后，中国 56 个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了，文化是众民族共同创造的事实也日益显著了。只要能保持安定团结，则共同创造的文化必能共同发展下去，达到更高更辉煌的阶段。

四 中华民族立国之本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文化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现在再进一步加以阐释。

北京正在建造一座中华故土园。园中立一巨大石碑，碑文是我撰写的，欧阳中石教授书丹。我的碑文的内容大体上是：1. 爱国主义；2. 凝聚力；3. 文化积淀。前二者是中华民族的特点，后者则是前二者的基础。三者实一而三、三而一者也。

爱国主义不是中国一国的专利，世界各国都讲。但是，我们必须认真严肃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爱国主义：一真，一假；一正义，一邪恶。所谓真的正义的爱国主义是指被侵略、被压迫、被虐待、被屠杀的民族的爱国之情。反之，侵略人、压迫人、虐待人、屠杀人的民族的爱国主义是假的、邪恶的。二者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中国的爱国主义属于前者。因为自先秦时代起，中国就边患不断，垂两千多年之久。存在决定意识，真的正义的爱国主义从而产生。历史上出了像苏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一大批受人尊敬的爱国者。有人主张，中国历史上那些制造边患的民族到了今天已经大多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因此中国历史上只有内战，而没有侵略，来自东方的南方的西方的敌人，其中包括倭和西方殖民主义者，是比较晚的事情。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他们把古代史近代化了。当时屠杀侵略中原人民的民族，确是地地道道的敌人。否则一部中国历史就只有内战牺牲者，而没有一

个爱国者，西湖的岳飞庙，以及布满全国各地的文丞相祠就都应该统统拆掉了，岂非天大的笑话！

至于凝聚力，则与爱国主义大有关联。《三国演义》上虽然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统计起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合多而分少。到了今天，建成了这样一个包括 56 个（这个数字可能还要增加）民族的统一的大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空前的壮举，连反对我们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我必须在这里提一提，我没有研究过国际法，我不知道，国际法中对国籍是怎样规定的。听说有的国家，比如美国，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的后嗣，只要在美国诞生，就自动有了美国国籍。但是，国籍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获得，也能够主动放弃的。中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有的就放弃了本国的国籍。这纯是个人行动，无可厚非。可是独有一些中国人，即使已经放弃了中国国籍，仍然爱着中国，尽上一切力量帮助中国。这在别的国家是极为罕见的。我认为，这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表现之一端。我曾再三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最爱国的知识分子，决非无稽之谈。现在有人出国，甚至改变国籍，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领导人，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寝食难安。设法留住人才，倒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我在上面说过，爱国主义和凝聚力的基础是深厚的文化积淀。这话有点太空洞，需要具体加以解释。

从先秦春秋战国的形势来看，中国本来很有可能走欧洲以后走的路子。但是，为什么竟没有走上去，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统一的文化背景。约略言之，可有以下几端。首先，尽管我们全国方言极多，但是我们从先秦起就有一种统一的文字。字体有过变化，从大篆到小篆，从小篆到隶书，从隶书到草书、楷书，至今全国皆通行。五四运动以后，文言改成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白话



文,仍然是全国皆通。这大大地便利了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其次,我们有统一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道德规范,连宗教的不同都没能阻碍这种规范的通行。再次,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汉族有基本上统一的宗教信仰。中国汉族是一个没有多大宗教需要的民族,对宗教信仰有点马马虎虎,他们是儒、释、道兼信,而以祖先崇拜为中心。中国历史上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宗教战争。我认为,这是我们民族的优越之处。我们相信的是一个各种宗教的混合体,并不追求泾渭分明。更次,我们有统一的艺术欣赏。中国在上世界上占有独特地位的书法和绘画,为全体人民,不管其宗教信仰如何,所共同欣赏。在音乐方面,欣赏稍有区别,但并不严重。许多少数民族的音乐汉族也能欣赏。最后,我们有基本上统一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表面上纷然杂陈,其实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以综合思维模式为基础的思想,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迥异其趣。从本体论上来看,宋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可以为代表。从方法论上来看,我们主张“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还可以举出一些特点来,以上五点不过是代表而已。这就是我所说的以文化深厚的积淀为基础的根据。

五 21 世纪研究工作的展望

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和千纪就会来到人间了。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的文化研究,特别是长江文化研究,会是什么样子呢?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这是我们都会关心的问题。

我想先从文化研究的目的谈起。学术研究,一般说来,目的是探讨真理,为研究而研究也是未可厚非的。但是从事学术研究而抱有一定的实用目的,也同样是可取的。我想,我们研究中国

文化,其中包括长江文化,是有目的的。首先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对内能够提高人民素质,对外则能使外国了解中国,我们不能抱瑰宝而自秘,我们想提高全世界人民的文化素质,使天下共此凉热。其次,特别是区域文化的研究,能促进中国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加强我们的团结。再次,文化研究能提高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大大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一点与上面的第二项有关。最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能济西方文化之穷。西方文化辉煌了几百年,现在弊端百出,全世界都大呼“保卫环境”,其根源就在这里。这种弊端必济之以东方文化,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主,才有可能减少。我们的文化研究,至少有以上四个目的。

长江文化研究属于区域文化研究的范畴。我在上面提到的楚文化、吴文化等等的研究,都是长江文化。今后地区文化的研究还会日益发展。专就目前来看,长江文化研究实居领先的地位。地域文化加在一起,就成为一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地域文化搞清楚了,整体文化也会因之而充实,而丰富。地域文化的研究离不开考古工作,而从目前情况来看,考古工作还将日益加强。到了新的世纪,考古工作的规模一定会日益加大,地区一定会日益加广,成果一定会日益丰富。其直接影响会使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长。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历史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已经完成的东西,已经过去了的东西,怎样还能延长呢?这样问,一点没错。但是我们对已经存在的、已经完成的、已经过去的东西的理解,却永远也不会圆满完成,永远也不可能划上句号。历史就属于这一类。如果没有近代的考古发掘工作,没有把地上资料,比如古代典籍之类,同考古结果加以对比研究,加以综合研究,我们对于古代史的了解能有现在这个水平吗?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五四运动时,北大的疑古学派的代表学者顾颉刚说大禹只是一条虫,但是现在怎样了呢?大禹早就由虫变成了人,恢